

The Language Issue in the Studies of Ecological Poetics and Aesthetics

Zhao Kuiying

Abstract: In today's Western ecological poetics and culture studies, the language issue has become a central concern that no one can afford to ignore or bypass. It is a matter to be tackled with before any theoretic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poetics and culture is at all possible. As two distinct academic fields, the one thing ecological poetics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have in common is they both hold "poetic dwelling" as their ultimate goal, and in their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y both should confront that Sphinx Riddle of the language issue. In today's ecological poetics and aesthetics, the looming up of the language issue is not accidental or collateral in its nature, but rather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a contemporary predicament the cause of which can be traced to two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postmodern context, dubbed as "the era of language", which is highly verbalized and sign-orientate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being, between language and worldview, between worldview and ecological crisis. The real state of nature as a result is eclipsed in this highly verbalized and sign-oriented postmodern context. Humans, as the "beings of language", are by their nature inseparable from language, which in turn molds and modifies in an intangible but profound way the thinking, values, and behavior of the language speakers. Between people's value system, world view, and their language view, between people's life mode and the mode of their speech, there is also a direct correlation. Thus the counter-ecology language view and counter-ecology language practice of some people are parti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current ecological crisis. This makes eco-aesthetics which takes ecological aesthetic existence or poetic dwelling as its ultimate goal, and the same as eco-poetics, have to face and put forward language issues. The revelation of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being, between language and people's world view, the critique on today's verbalized social reality and linguistic theories, i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purpose of the working out of the language issue in the studies of ecological poetics and aesthetics, the larger prospect is to build and establish an ecological view of language as the linguistic theoretic foundation of today's ecological poetics and aesthetics studies.

Keywords: ecological poetics; ecological aesthetics; poetic dwelling; "era of language"

Author: Zhao Kuiying earned her MA and PhD from Shandong University in 1994 and in 2000 respectively. She then became a teacher a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full professorship in 2005. She worked 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 2011. Currently she is a Professor and a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Art Institute of Nanj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covers the fields of Western aesthetics,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comparative studie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colinguistics and theory of art. Her main works include: *Comparative Study on Basic Top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nguistic Poetics*, *The Order of Chaos: Study on Basic Topics of Aesthetic Literar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Series in Translation* (for which she serves as the editor in chief).

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何以提出語言問題

趙奎英



[摘要] 語言問題堪稱當今西方生態詩學文化研究中的一個“魔域”，沒有誰能無視它的存在，更沒有誰能越過它直接談論生態詩學文化的理論建構問題。生態詩學與生態美學是兩個不同的學術研究領域，如果說兩者有什麼共同點的話，那就是它們都以“詩意棲居”作為最終目標，在理論建構方面都需要面對和提出語言問題。無論是以喬納森·貝特、尼科博克等人為代表的生態詩學研究，還是以曾繁仁等人為代表的生態美學研究，莫不如此。在當今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中提出語言問題不是偶然的，它既是由生態文化興起的高度語言化、符號化的被稱為“語言時代”的後現代語境促動的，也是由

語言與存在、語言與世界觀、世界觀與生態危機之間的內在關係決定的。高度語言化、符號化的後現代語境，一方面表現在後現代的社會現實狀況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後現代的文化觀念理論上；高度符號化、語言化的後現代社會現實從現實形態上遮蔽了自然，強調話語優先地位的解構性的後現代文化理論，則從觀念形態上根本性地取消了自然。二者相互呼應，共同壓抑、消解着“自然”的現實和“自然”的概念。人作為“語言存在物”，其思維、觀念乃至行為都是與語言交織在一起並受到語言的模塑和影響的，其存在觀、世界觀與語言觀之間，其存在方式與言語方式之間，也是存在着直接聯繫的。那種非生態的語言觀念和語言實踐對於非生態的世界觀，對於當今的生態危機是負有部分責任的。這使得以最終促成生態審美生存或詩意棲居為目標的生態美學與生態詩學研究一樣，都不得不面對並提出語言問題。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中提出語言問題，不祇是要揭示語言與存在、語言與世界觀之間的聯繫，或對當今的語言化現實和語言理論進行批判，而是要尋找一種生態語言觀，為當今的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奠定語言理論基礎依據。

[關鍵詞] 生態詩學 生態美學 詩意棲居 語言的時代

[作者簡介] 趙奎英，1994年、2000年在山東大學分別獲得文學碩士和文學博士學位，2005年任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2011年在英國伯明翰大學“英語高級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現為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方美學、語言詩學、中西文論比較、生態語言文化以及藝術理論等方面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西語言詩學基本問題比較研究》《混沌的秩序：審美語言基本問題研究》，主編有“語言學與詩學譯叢”。

語言問題是當今西方生態批評、環境批評、綠色研究等生態詩學文化研究者普遍感到焦慮的問題，沒有誰能無視它的存在，更沒有誰能越過它直接談論生態詩學文化的理論建構問題。生態詩學研究者們不約而同地提出語言問題不是偶然的，它既是由生態文化興起的高度語言化、符號化的“後現代”語境促發的，也是由語言與存在、語言與世界觀、世界觀與生態危機之間的關係內在地決定的。但這一關係似乎尚未引起國內學術界的充分注意。鑒於此種情況，筆者擬從生態詩學與生態美學研究的“詩意棲居”目標、後現代的“語言時代”語境，以及人作為“語言存在物”的存在特徵三個方面，對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與語言的關係問題加以探討，以期對當今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的語言理論基礎建構有所裨益。

一 “詩意棲居”目標與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生態批評”在西方歐美國家興起、“生態美學”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以來，如今都已成為文學、美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學術領域。但伴隨着生態批評、生態美學的成長壯大，人們對它們的批評質疑似乎也從未停歇。學術界對於“生態批評”的批評主要認為它缺乏理論化，對於生態美學質疑最多的則是它作為一個學科能不能成立的問題。而這些爭議的一個共同作用，則是促使生態批評和生態美學研究進行更堅實的理論建構。

其實，關於生態批評的理論建構問題，如果換一個角度觀察，沿用西方傳統將“文學理論”稱之為“詩學”的話，那麼“生態文學理論”自然也可以稱作“生態詩學”。《生態批評讀本》編者之一格爾特菲爾蒂（Cheryll Glotfelty）就談到，生態批評家的“另一項重要理論化工程，就是試圖發展出一種生態詩學（ecological poetics）”^①。美國生態批評的先行者魯克特（William Rueckert），英國生態批評的代表人物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美國環境批評的代表人物布伊爾（Lawrence Buell），都提到過建立“生態詩學”的問題；另外，華和榮（Hwa Yol Jung）、斯金納（Jonathan Skinner）等也對“生態詩學”的界定做過努力；尼科博克（Scott Knickerbocker）更是在2012年出版了《生態詩學》專著，為生態詩學的建構做出了直接貢獻。

較早提出“生態詩學”概念的是魯克特。他在《文學與生態學：一項生態批評的實驗》（1978）一文中說：“我將嘗試探索把生態學與‘生態’概念應用於文學研究。因為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一門學科、一種人類視野的基礎）在我近年來的所有研究中，是與我們所居住世界的現在與將來最為相關的。我將試圖發現某種關於文學生態學的東西，或者通過把‘生態’概念應用於文學的閱讀、教學和寫作，去發展一種生態詩學（ecological poetics）。”^②在魯克特看來，生態詩學基本上相當於“文學生態學”，是一種把生態學應用於文學的研究，是詩學與生態學的結合。由於生態學是與人所居住的世界最為相關的，生態詩學核心任務因此也是與創造一種健康的居住環境相關的。六年後，華和榮在《通向生態詩學的定義》（1984）一文中，再次提出對生態詩學的界定問題^③，認為生態詩學是“把兩種觀念無縫地接合為一”，是把“生態學與詩學親密地聚集在一起”。^④華和榮的生態詩學明顯受到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 Heidegger, 1889—1976）思想的影響，他認為“海德格爾的思想對於生態詩學來說是一種無可挑剔的路標”，“對於海德格爾來說，詩歌不是為逃避大地而超越大地，而是把人（男人和女人）帶向大地，使人屬於大地：它讓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所以，在華和榮那裏，“生態詩人的思想應當教會我們如何棲居在大地上”。^⑤華和榮之後，更系統地探討生態詩學建立問題的是喬納森·貝

① Cheryll Glotfelty,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Georgia: Georg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XXIV.

② William Rueckert, "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107.

③ 朱翠鳳：《溫德爾·貝里的生態詩學思想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第4頁。在此向朱翠鳳博士提供的有關華和榮的寶貴資料表示感謝。

④⑤ Hwa Yol Jung, "Toward the Definition of Ecopoetics", *Mickle Street Review* 5 (1984): 25, 25-26.

特。他的《大地之歌》（2000）其實就是一部浪漫主義的“生態詩學”。他說：“我把這部書看作是一個生態詩學的實驗。”^①與華和榮相一致，貝特的生態詩學思想也明顯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也強調生態詩學與詩意棲居的關係。不過，貝特是從對“生態”“詩學”的原義的考察入手的。貝特通過詞源學的考察指出，“生態”（ecology）的原義就是“家”“房屋”“棲居地”，“‘生態’的前綴eco-是從古希臘詞（oikos）‘家或棲居之地’來的”。^②而他說的“詩”（poetry）也是從古希臘意義上的“poiesis”來理解的，意思是“製作”（making）。這裏的製作，不僅指用語言進行的製作，也指用其他材料進行的藝術製作，但後來發展成為專門的詩意藝術——“詩歌”。他把“生態”與“詩學”的原義相結合，認為“生態詩學追問的是在什麼方面一首詩可以被視作是一種關於棲居地的製作”。在貝特看來，“生態詩學”與更重實踐的、具有更強政治色彩的“生態批評”不同，“生態詩學不是作為環境問題的假定或建議提出來的，而是作為對在地球上棲居意味着什麼的反思提出來的。生態詩學必須關注意識。當涉及實踐的時候，我們必須說另一種話語”。^③由此可見，在貝特那裏，生態詩學的目標是與改變人們的意識，使人學會在大地上棲居並聯繫着。貝特之後，使用“生態詩學”概念的人明顯增多，並且同樣也強調“生態詩學”與“詩意棲居”的關係。例如，於2001年創辦《生態詩學》期刊的斯金納，在兩次界定“生態詩學”時，都突出強調生態詩學與棲居、家園的關係。在《生態詩學》創刊號上，他對“生態詩學”的界定是：“‘Eco’這裏指——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們與其他幾百萬物種共同分享的房屋，我們的行星地球。‘Poetics’被用作‘創制’（poesis）或製作（making），未必着重對創造性藝術的批評（也不必然相反）。因此，生態詩學，是一種家園的製作。”^④在線上期刊“Jacket 2”中，“考慮到當下一些生態詩學的實例”，他再次嘗試給生態詩學下定義時，生態詩學的對象和範圍都大大拓展了，“轉而擴展到相關領域（詩學作為所有形式的製作），包括視覺的、聽覺的和身體的藝術”等，但他並沒有背離在大地上“棲居”這個根本問題。他說：與其把某種寫作定位為“生態詩學”，不如把生態詩學當作一種地方特性的形式更有用。這種形式把焦點從主題轉移到慣用語、修辭和對各種比喻用法的研究、轉移到對綠色話語自身的制度化批判，“以及一系列的彙聚在我們現今唯一知道的地球‘家園’（oikos）中的實踐”。^⑤由此可以看出，在這裏，生態詩學的目標仍然是與“地球家園”相關的。

與興盛於西方的生態詩學、生態批評有所不同，生態美學在中國是一個更具有本土性的研究領域。儘管“生態美學”概念最早也是在西方出現的，由加拿大學者約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於1972年在《面向生態美學的札記》一文中提出^⑥，比中國學者李欣復發表在1994年的《論生態美學》一文早了二十餘年，但生態美學研究的主要陣地在中國。尤為不同的是，在當今美學研究中，西方學者更傾向於使用“環境美學”的概念，中國學者更傾向於使用“生態美學”的概念。西方學者所說的“生態美學”主要是一種生態學的環境美學，可以看作是環境美學的一部分；而中國學者的生態美學研究雖然也受到西方環境美學的影響，但它與西方學者的環境美學以及生態美學研究都有明顯的差異。

中國學術界的生態美學研究從李欣復的《論生態美學》一文開始，到徐恒醇於2000年出版《生態美學》著作，以及後來一系列論著的出版，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儘管學術界在“生態美學能否成為一個學科”問題上爭議不斷，生態美學研究取得的成就卻為世人所矚目。在當前的生態美學研究中，“尤以曾繁仁‘生態存在論’美學觀影響為巨”。^⑦而剖析他的生態存在論

①②③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London: Picador, 2000), 64, 75, 266.

④ Jonathan Skinner, “Editor’s Statement”, *Ecopoetics* 1 (2001): 5-8. See Christopher Arigo, “Notes Toward an Ecopoetics”, *How2*. http://www.asu.edu/pipercenter/how2journal/vol_3_no_2/ecopoetics/essays/arigo.html.

⑤ <http://jacket2.org/commentary/jonathan-skinner>

⑥ Joseph W. Meeker, “Notes Toward an Ecological Esthetic”, *Canadian Fiction Magazine* 2 (1972): 4-15.

⑦ 朱立元、栗永清：“從生態美學到生態存在論美學”，《東方叢刊》3（2009）：245。

美學，正是以培養人們的“生態審美觀”和“生態存在觀”，促成一種“生態審美棲居”或“詩意地棲居”為根本目標。^①如此一來，不難看出，“生態美學”與“生態詩學”儘管是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在許多方面也存在着明顯差別，但在根本目標上卻是一致的：都是指向如何“詩意地棲居”。

至於如何實現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的這一根本目標，華和榮認為：“生態詩學的‘職責’（calling）是通過語言在人類及其周圍世界之間發明一種新的情感認識論。”在這一重要意義上，“生態詩人既是語言的運用者，也是語言的看護者”，“他的語言必須與人與物的世界相諧和”；生態詩人“教會我們如何與其他人，與自然中的大量的、無數的物建立起親密的關係”。^②一句話，教會人們如何在大地上詩意地棲居。與華和榮相似，貝特也認為，生態詩學的建立必須通過“語言之路”：“由於生態詩學肯定的不祇是存在，而且還有自然之物本身的神聖性”，“它需要尋找到一條穿越懷疑主義，到達一個清理過的、超越了那種把語言視作一個自我封閉系統的重重障礙的道路”。^③在貝特看來，生態詩學要想實現自己的目標，進行理論建構，首先面對的一個理論問題是尋找一種能超越那種把語言視作封閉系統的語言觀的問題。

另外，談到“生態詩學”的環境批評家布伊爾雖然對於生態詩學本身沒有太多闡述，但也提出“重塑意識”“重新棲居”的問題，並且強調語言問題對於生態批評的意義。在他看來，“生態批評的任務不祇在於鼓勵讀者重新去與自然‘接觸’，而要灌輸人類存在的‘環境性’（environmentalist）意識——作為一個物種的人祇是他們所棲居的生態圈的一部分——同時還要意識到這一事實在所有思維活動中留下的印記”。^④布伊爾認為：“所有關於如何藝術處理物質環境的研究，遲早都必須考慮一個元問題：如何解釋文本世界與歷史或現實的經驗世界之間的關係。”這一關係，是布伊爾後期環境批評中着力探討一個的“普遍問題”，即“環境批評如何包含並理論地表述‘詞語—世界’與‘實在世界’的關係（或無關）”。^⑤這一關係歸根到底也是語言哲學中的那個基本問題，即“語言與世界”“語言與實在”“語詞與事物”的關係問題。而尼科博克的著作《生態詩學》副標題即為“自然的語言，語言的自然”，更是明確地提出生態詩學的建構需要系統地探討語言與自然的關係問題。

根據海德格爾的觀點，棲居問題就是一個語言問題，因為語言是“存在的家園”，“唯語言纔使存在者作為存在者進入敞開領域之中。在沒有語言的地方，便沒有存在者的任何敞開性，因而也沒有不存在者和虛空的任何敞開性”。^⑥為了認識到這一點，海德格爾認為需要提出一種“正確的語言概念”，“重要的是學會在語言之說中棲居”。^⑦其實，無論是華和榮、貝特的生態詩學思想，還是曾繁仁的生態美學思想，都受到了海德格爾後期哲學和詩學的影響與啓發。

以上的梳理表明，生態詩學、生態美學共同關心的棲居問題是與語言問題密切相關的。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理論建構面對的一個首要問題，是尋找一種新的能夠作為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理論基礎的語言觀問題。貝特、布伊爾、尼科博克等人在生態詩學理論建構中提出語言問題，絕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它已成為當今西方生態批評、環境批評、綠色文化研究等各種生態詩學、生態文化研究的一個基本理路。也就是說，要想使生態詩學、生態文化研究站得住腳，首先要糾正各種語言理論對生態文化理論的偏頗，尤其要糾正結構主義把語言看成一個自我封閉的形式系統、後結構主義把自然看成一種文化建構的話語優先理論。儘管目前的生態詩學研究對待結構—後結構主義的關係不像文學批評初始時期那樣對立，但對於語言觀念的反思仍然勢不可免。原因在

① 曾繁仁：《生態美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第282、316—317頁。

② Hwa Yol Jung, "Toward the Definition of Ecopoetics", *Mickle Street Review* 5 (1984): 26-27.

③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247-248.

④ [美]布依爾、韋清琦：“打開中美生態批評的對話視窗——訪勞倫斯·布依爾”，《文藝研究》1（2004）。

⑤ [美]勞倫斯·布伊爾：《環境批評的未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劉蓓譯，第34頁。

⑥ [德]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上卷，第294—295頁。

⑦ [德]海德格爾：“語言之說”，《海德格爾選集》，下卷，第1003—1004頁。

於，語言問題與生態問題本來就存在着關聯，人們無法越過語言問題直接談論生態詩學的建構問題。語言問題與生態問題的關聯，一方面是由人的語言存在本性內在地決定了的，另一方面則是由生態文化興起的語言化、符號化的後現代語境促發的。

二 “語言時代”與生態詩學、生態美學中的語言問題

生態問題雖然早已存在，但人們對生態文化問題的自覺關注則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也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後現代”時期開始的。如果說西方歷史上的“現代”是以工業文明為標誌的，那麼“後現代”也即“後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或被後現代理論家們宣稱的“高科技媒體社會”，則是以高度符號化、語言化的後工業文明為標誌的。就像英國語言學家韓禮德（Michael A. K. Halliday）所說的：“一個不言自明的真理是，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歷史時期的中間，這時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經歷快速的變化。由於二十世紀晚期的技術，我們中的許多人都不再花時間生產和交換商品或服務，而是生產和交換信息。工業革命時期的城市的中心是火車站或飛機場，在那裏，人們及他們的商品流向各地，二十一世紀的城市——一種多功能城市，則被不適當地稱之為信息中心或‘心靈運輸’（teleport）場。在那裏，信息交流依賴於集成的人造衛星和陸上的光學纖維網絡系統。”“在這樣一種環境中，人們將越來越多地與符號系統發生交會，越來越少地與社會的、生物的或自然的環境打交道——這種生活方式已經是許多人都熟悉的方式。”^①

在這種後工業文明中，不僅社會現實是高度語言化、符號化的，堪稱一個“實實在在的語言時代”^②，而且文化觀念也是高度語言化、符號化的。文化觀念的語言化、符號化主要表現在，以後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強調話語優先性的理論在西方後現代理論中佔了主導地位。就像後現代理論研究者凱爾納（Douglas Kellner）、貝斯特（Steven Best）所指出的：“就賦予話語理論以優先地位這一點而言，後現代理論大體上追隨了後結構主義。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後結構主義，都發展出了用符號系統及其符碼和話語來分析文化和社會的話語理論。”在這種話語理論看來：“心理、社會以及日常生活乃是由語言、符號、形象、符碼以及指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s）組織起來的。”^③在後結構主義的話語理論中，福柯（M. Foucault, 1926—1984）的話語理論堪稱典型代表。“福柯之後，一些信奉話語論的學者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念，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業已形成了某種‘話語拜物教’，把話語看作是無所不能的、神奇的建構性力量，所以結論必然是‘一切均在話語中’。”^④也就是說，不僅從社會現實狀況上看，從觀念文化上看，後現代語境也具有突出的語言化、符號化特徵。

在流行的認知觀念中，當今生態危機主要是由工業文明造成的，產生於後現代語境中的生態學、生態批評等生態文化，作為後現代文化的組成部分，是基於對現代工業文明的批判反思。但實際上，並不祇是工業文明纔是生態問題的罪魁禍首，也不是所有的後工業文明或後現代文化都是生態文化的福音。如果說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使自然界受到了血淋淋的“外傷”，損害了自然的“肌體”，那麼，以高度語言化、符號化為標誌的後工業文明，則讓自然界受到了看不見的“內傷”，加劇了當今時代的生態危機。這首先是因為，高度符號化、語言化的後現代的社會現實從現實形態上遮蔽了自然，它麻木了人們對自然的感覺，抑制了人們對自然的慾望。它讓人們沉溺於虛擬的符號世界之中，通過與一個虛擬世界的遊戲，使人們忘卻了與真實的自然世界的交往，加劇了人與自然界的疏離。其次還在於，以後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強調話語優先地位的解構性的

① M.A.K. Halliday and J.R. Martin, *Writing Science, Literacy and Discursive Power* (London and Washington, D.C.: The Falmer Press, 1993), 21.

② [法]海然熱：《語言人——論語言學對人文科學的貢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張組建譯，第4頁。

③ [美]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後現代理論批判性質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張志斌譯，第33—34頁。

④ 周憲：“福柯話語理論批判”，《文藝理論研究》1（2013）。

後現代文化理論，從觀念形態上根本性地取消了自然。在它們看來，所謂的“自然”不過是一種文化的“建構”、一種語言的“詞彙”，它從來都沒有真正存在過。符號化、語言化的後現代狀況與強調話語優先性的後現代理論相互呼應，共同壓抑、消解着“自然”的現實和“自然”的概念，難怪美國後現代思想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或譯為“杰姆遜”“詹明信”）認為，在當今西方的後工業社會裏，真正的“自然”已不復存在，各種各樣的現實就像一個典型的符號系統，在把語言學當作一種方法和把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場有規律的虛妄的惡夢之間存在着非常和諧的對應關係。^①

與這種整體的時代氛圍相一致，在這種後現代語境中生成的許多文學、文化批評理論也瀰漫着取消自然、壓抑自然存在的氣息。對此，英國生態批評家、綠色研究者勞倫斯·庫珀（Laurence Coupe）認為，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來，許多不同的批評理論，如形式主義，心理分析，新歷史主義，解構主義等，它們一個共同假設是，“所謂的‘自然’，它首先是在文化話語中作為一個術語而存在，離開這一點，它既沒有存在也沒有意義”，並進而批評道，“宣稱‘沒有自然這樣一種東西’幾乎已經成了文學或文化研究中的一種義務。一種巨大的恐慌是害怕被發現犯所謂的‘指稱的謬誤’”。^②

如果世界上壓根就不存在“自然”這種東西，那麼，對自然的敬畏、嚮往、保護當然就既無必要也無可能了。這對一切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生態文化研究來說不啻為一種釜底抽薪般的打擊。因此，在當今西方的生態文化研究中，無論是為生態學提供支持的後現代科學家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還是生態批評家、綠色文化研究者，都對這種後現代的語言、文化觀念表現出了高度的警惕。庫珀一方面肯定“理論的懷疑主義，已經被證實為有益的：以往的批評家太過頻繁地假定他們所喜歡的文學作品告訴了關於世界的‘真理’”；另一方面又提醒說，這種傾向“又鼓勵了一種霸道的文化主義，藉此，對真理的懷疑使得對非文本一世界存在的拒絕成為必須”，這使得他們在“試圖尋求逃避幼稚的時候，卻已經犯下了‘符號學謬誤’”；並特別指出：“綠色研究的功能之一是必須抵制這種災難性的錯誤”。為此，綠色研究在相關的意義上做兩種工作：一是“挑戰工業主義的邏輯”，反對以技術進步損害自然；二是“挑戰自滿的文化主義”，質疑把自然看作是由“語言生產出來的”某種東西的有效性。^③

因此可以說，不僅是現代工業文明破壞了自然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導致了生態問題，也不祇是現代工業文明纔是需要批判反思的東西，後現代文化本身也是需要批判反思的。西方社會的“後現代狀況”和以後結構主義為代表的解構主義的“後現代理論”，破壞、疏離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使人類的物理生態甚至精神生態問題進一步加劇。可怕的是，這一現象並不被人所重視，甚至不為人所覺察。這也正是後工業文明使自然遭受看不見的“內傷”的原因。如果說，現代性有“審美的現代性”與“工業的現代性”兩種類型，“審美的現代性”已經包含了對“工業現代性”的反思，那麼，後現代性也有兩種類型，即生態（事物的、自然的）的後現代性與話語的、符號的後現代性。而生態的後現代性不僅是對工業文明進行批判的結果，本身也潛在地包含了對話語的、符號的後現代性的反思，尤其是生態批評理論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後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的批評和拒斥。如果拋開生態危機這一現實根源不談，可以說，生態批評的興起，就直接起於對以話語壓抑自然的各種文學、文化批評理論的反動。因此，從一開始，它就與語言觀念或語言理論發生了交鋒或交集。

尼科博克在《生態詩學》中說：“儘管提出有關語言的這些問題是文學理論的目的，大多數的第一波生態批評（生態的文學批評），在大約十至十五年的作為一個公認的學術領域的存在中，有意識地回應了有異議的其他文學理論，尤其是後結構主義理論。”“簡單地說，在與表象

①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語言的牢籠》（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李自修譯，第4頁。

②③ Laurence Coupe ed.,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2, 2-4.

論的戰鬥中，如果說後結構主義者站在語言的一邊，那麼生態批評家大多數則站在物理現實的一邊。”^①但在尼科博克看來，語言與自然不是對立的，因為語言本身也是來自於自然。生態詩學就是要為語言與自然、倫理與審美之間的友好關係提供自然的場所。他的專著《生態詩學》，正是致力於說明倫理與美學、語言與自然在“新形式主義”“語言詩歌”這些被他稱為“有機形式主義詩歌”中是如何統一起來。^②不管他的努力是否成功，但可以看出，生態批評一產生就與結構主義的語言觀發生交鋒，以詩意棲居為根本目標的生態詩學建構，首先要面對的是語言觀問題。

對於中國來說，雖然很難說已完全進入到“後工業社會”，但由於目前經濟的全球化趨勢，由於中國經濟、技術的迅速發展，在各大中小城市，甚至一些發達的鄉鎮，也都儼然進入了後現代理論家所描述的那種“高科技術媒體社會”，電視、電腦、手機、網絡等等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因此，高度語言化、符號化，也成為當今中國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所處時代語境的突出特徵。在這一“語言的時代”，不僅現實狀況是高度符號化、語言化的，而且各種各樣的觀念理論也為這種高度符號化、語言化的現實提供支持性、肯定性說明。而要在“語言的時代”研究生態詩學、生態美學，就不得不提出、不得不面對語言問題。它一方面需要研究者對目前高度符號化、語言化的現實狀況進行批判考察，抑制或抵制由於符號、話語的過度膨脹帶來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的非自然化、非生態化；另一方面則需要認真研究各種語言觀念或語言理論，對那種具有生態破壞性的語言觀念或語言理論進行批判反思，對那些具有生態建構性的語言觀念和語言理論進行挖掘闡發，以期為後現代語境中的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提供一種語言理論基礎支撐。

實際上，在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中提出語言問題，並非僅是由生態文化興起的語言化、符號化的後現代語境促動的，它也是人類作為“語言存在物”的特性內在地決定的。通過這一點，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看起來與語言問題沒有直接關係的生態美學建構為何不能回避語言問題。

三 “語言存在物”與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

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出現了所謂“語言學轉向”，以及隨着後工業文明的發展而出現所謂的“語言的時代”，並不是說以往時代的哲學和理論不關注語言，原來時代的人的存在不與語言相互纏繞。從中西方哲學的發展史看，在其起點處無不把語言問題作為最基本的哲學問題，而人自從成為人的那一天起就是一種語言的動物，並且中西方哲學也很早就開始以語言界定人的本質或存在了。例如，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就說過，“人是邏各斯的動物”（“邏各斯”的原義即“言說”）；卡西爾（*E. Cassirer*，1874—1945）也說，“人是符號的動物”；海德格爾更是從現象學存在論角度提出，“語言是存在的家園”。人作為一種語言性的存在物，其思維、觀念乃至行為都是與語言交織在一起並受到語言的模塑和影響的，其存在觀、世界觀與語言觀之間，其存在方式與言語方式之間，也是存在着直接聯繫的。由於生態危機是與人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直接相關的，如果人的語言觀聯繫着他的存在觀、世界觀，人的言說方式影響着他的行為方式，如果沒有一種生態語言觀和生態言說方式，也就不可能擁有生態存在觀，也就不可能建立起人與世界之間的生態關聯。如果生態美學研究以生態存在論為基礎，以培養人們的生態審美觀和生態存在觀、並最終促成一種“生態審美棲居”為目標，它也不得不面對與語言的關係問題。

說到生態審美棲居和人作為語言存在物的問題，就不能不提到海德格爾的現象學存在論。海德格爾的現象學存在論其實就是一種“生態存在論”，也是一種“語言存在論”。實際上，不僅海德格爾關心語言與存在的關係，有不少哲學家、語言學家也曾對語言與存在、語言與思維、

①② Scott Knickerbocker, *Ecopoetics: the Language of Nature,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mherst an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2), 2-3, 9.

語言與世界觀之間的關係做過論述。早在古希臘，巴門尼德（Παρμενίδης，約前515—前5世紀中葉）就提出語言與存在、思維的同一性問題；在近代，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提出了“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①十八世紀的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W. V. Humboldt, 1767—1835）還提出了語言世界觀的問題，認為“每一語言都包含着一种獨特的世界觀”，“個人更多地是通過語言形成世界觀”。^②“薩丕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即“語言相對論”）更是進一步發展了語言就是一種世界觀看法。薩丕爾（Edward Sapir, 1884—1939）認為：“人類並不僅僅生活在客觀世界中，也不僅僅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樣生活在社會活動中，而更大程度地是生活在語言之中，語言已經成爲人類社會的表達媒介。如果以爲一個人可以不運用語言而使自己基本適應現實，或以爲語言僅僅是一種解決特定的交際問題或思考的隨行工具，那完全是一種錯覺。事實上，現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地建立在一個社團的語言習慣基礎上的……我們看到、聽到以及以其他方式獲得的體驗，大都基於我們社會的語言中預置的某種解釋。”^③沃爾夫（B. L. Whorf, 1897—1941）認為，“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特有的模式或型式。這些型式構成了語言形式化的一面，即‘語法’”；“使用明顯不同的語法的人，會因其使用的語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觀察行爲，對相似的外在觀察行爲也會有不同的評價；因此，作爲觀察者的他們是不對等的，也勢必會產生某種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觀”；“現代科學的世界觀”正是“根據西方印歐語言的基本語法特徵概括而成的”。^④

與此相一致，英國語言學家韓禮德也指出：在“語法的內層”，存在着一個由句子“逐漸合成的世界觀，一個我們無意識地將我們的行爲和生存策略都建立其上的隱蔽的經驗的理論”，並認為這是一種“語法特徵的綜合徵”，“這種綜合徵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共謀解釋現實；而且是以一種對我們作爲物種的健康不再有好處的方式進行的”。^⑤正是在此基礎上，加拿大學者薩若·喬拉（Saroj Chawla）說：“我堅持認爲，在語言、哲學（或稱世界觀）與我們如何對待自然環境之間存在着緊密的關係。”又說：“種族語言學家或文化人類學家已經指出，我們的語言習慣，亦即我們安排和解釋客觀現實的方式，對我們所有的活動都會產生深刻影響。一個共同體的語言習慣影響我們的感知和經驗，使我們預先偏向於選擇某種特定的解釋和行爲方式。‘現實世界’很大程度上無意識地建立在一種群體的語言習慣之上。”^⑥如果認爲人們的世界觀和行爲方式完全是由語言決定的，顯然有些極端；但如果說人們的世界觀、思維方式、行爲方式都會受到特定的語言觀念、語言結構、言語方式的模塑和影響，則是絕不爲過的。正是基於此，生態語言學家們纔會進而認爲，“生物環境的危機部分地是由語言造成的——或者是由特別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語言結構造成的，這種結構預先決定了說話者對待環境的成問題的感知和行爲；或者是由語言共同體中的一些成員選擇的特別的話語實踐造成的”^⑦。由此也可以說，語言問題與生態問題具有內在關聯。正是這一內在關聯，使得看起來與語言沒有多少關係的生態美學、生態詩學，也不得不面對和提出語言問題。

在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中提出語言問題，不祇是要揭示語言與存在、語言與世界觀之間的聯繫，或對當今的語言化現實和語言理論進行批評。生態文學研究者拉哥蘭（Rebecca Raglon）、舒特米亞（Scholtmeijer）指出，目前在生態研究對於語言的一種主導性觀點是對於它的批評，“這種批評集中於語言創造的應對大量的社會與環境疾病負責的範疇方面。這種批評的

① [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卷，第525頁。

② [德]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的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姚小平譯，第72頁。

③④ [美]沃爾夫：《論語言、思維和現實——沃爾夫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高一虹等譯，第127、235—236頁。

⑤ Michael Halliday,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193.

⑥ Saroj Chawla, “Linguistic and Philosophical Roots of Our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115-116.

⑦ Alwin Fill and Peter Mühlhäusler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5.

共識是，當面對環境災難和人類悲劇時，文學、語言和文化應負有很大的責任。因為語言和文學指導我們的感知，它們在摧毀世界的活動中參與了犯罪。”但作者這裏提出語言問題不祇是重複指控語言的罪行，而是提出一種新的可能性。因為，語言可以參與犯罪，也可以參與拯救；有非生態的語言，也可以有生態的語言。所以，她們反問道：難道“語言祇能把我們囚禁在我們創造的概念中嗎？難道文學真的祇是我們所說的‘環境危機’的有罪的參與者嗎？難道語言、文學就不能發揮其他的作用了？尤其是在改善我們與自然的關係方面？”^①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作者的目標是在關注關於語言的主導觀點時，倡導拓展吸收這種觀點，即“文學表現出這樣的姿態，在重建一種有力的自然詞語”以抵抗參與犯罪的“敘述”方面同樣具有重要作用，進而尋找一種能把語言與自然統一起來生態語言觀，作為生態詩學、生態美學建構的語言哲學基礎。

與中國學術界波瀾不驚地看待語言問題在生態詩學、生態美學建構中的意義相比，西方學術界的生態詩學、生態文化研究則對語言問題表現出了高度的敏感和熱情。不僅貝特、布伊爾、庫珀、科尼博克等人的生態批評、環境批評、綠色研究、生態詩學研究都明確提出語言問題，而且瑞格比（Kate Rigby）在《生態批評》一文中專門列出一節討論“重建語言基礎”的問題^②，霍華斯（Willam Howarth）在《生態批評的一些原則》中也提出“生態是與語言表現的歷史緊密相關的一門科學”，並專門列出“語言與批評”來討論生態批評與語言相關的問題。^③另外，那些有關文學寫作和文學批評應為“自然言說”的主張，也無不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使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與語言問題糾纏交集在一起。西方後現代語境中的生態詩學、文化研究，雖然敏銳地意識到某些語言觀念對於生態研究致命的危害性，但從總體上看，他們還未找到一種能為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提供全面支持的語言觀念或語言理論作為其語言哲學基礎。因此，目前中西方的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仍處於一種語言理論基礎的困境之中。這也正是筆者在生態詩學、生態美學研究中提出語言問題，並試圖尋找一種真正的生態語言觀作為其語言哲學基礎的原因。

① Rebecca Raglon and Marian Scholtmeijer, "Heading Off the Trail: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Nature's Resistance To Narrative", *Beyond Nature Writing: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Ecocriticism*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1), 248.

② Kate Rigby, "Ecocriticism",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1.

③ Willam Howarth, "Some Principles of Ecocriticis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Georgia: Georg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69, 76.